

感悟红色政权

——20世纪前半期中共根据地政权研究

田利军◎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悟红色政权: 20 世纪前半期中共根据地政权研究
/ 田利军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220-08395-2

I. ①感… II. ①田… III. ①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K26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8444 号

GANWU HONGSE ZHENGQUAN

感悟红色政权

——20 世纪前半期中共根据地政权研究
田利军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喻磊 蒋咏宁
戴雨虹
徐英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208mm
12. 125
340 千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08395-2
26. 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前 言

没有根据地，就没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没有根据地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壮大的历史。

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没有根据地丰富的土地革命的经验、政权建设的经验、经济建设的经验、军事斗争的经验，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发展难以想象！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中共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长期积蓄发展力量，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根据地建设历史中，不仅深入进行了土地革命，得到了占中国人数最多的亿万农民的拥护，铸造了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而且建构了一套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实践了议行合一的民主共和制，成功实现了在中国版图内的局部执政。

早在 1920 年代末 1930 年代初，毛泽东就把中共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提出并实践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建立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认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根据地则是中国革命的依托和阵地。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难以成功，土地革命不能开展，土地革命的成果难以保证。

重视根据地建设是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中国革命特点的结果，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黄巢、李自成流动作战以致失败的历史教训的结果。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强调，“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①是极严重的错误。

学界一直比较重视根据地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资料方面先后出版了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甘肃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1~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陕西省、四川省文化厅编《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此外，原各根据地所在区域的党史办、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了大量的资料，按不同的根据地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分别出版，如中共广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各根据地史料的搜集整理为根据地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就笔者所见：

1980年代重要的著作有马齐彬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廉编《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

1990年代的重要著作有魏宏运著《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

^①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出版社，1990年版），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唐志宏、谭继和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21世纪前10年又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如陈廷焯著《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谭克绳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史》上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

有关根据地史的研究成果涉及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过专门研究根据地政权的不多，目前所见有杨圣清著《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蒋伯英、郭若平《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后者并非研究政权组织本身而是梳理政权建设的历史。

本书是笔者多年研究根据地政权结果的汇集，当中不少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展示。全书分三篇：

第一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研究，主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行政监督机关、司法机关、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为研究对象。本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图总结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

第二篇为川西北康北红色政权及相关问题研究，主要以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康北苏维埃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波巴共和国政权为研究对象。本篇指出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康北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早期实践。同时为了对川西北、康北红色政权及格勒得沙共和国、波巴共和国有接近历史真实的正确解读，笔者对川西北土司土官在民国时期的变动作了系统考证，并对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后川西北土司土官“一边倒”地反对红军的政治态度及原因作了仔细的分析。

第三篇为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研究。本篇不同于以往根据地政权研究之处在于把视角放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探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中的民主问题、廉政问题、妇

女参政问题。本篇通过一系列典型个案的分析，指出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是民主的、廉洁的、平等的、开放的。

必须强调的是本书虽名为“20世纪前半期中共根据地政权研究”，但并非根据地政权史、政权建设史，它并没有建构一套严密的体系，而是根据笔者研究所长，随心所欲，将与根据地政权相关的研究展示出来，显得较为松散。从研究时段看，本书主要立足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中期，并未涉及1940年代末解放区政权。从研究内容看，笔者第一篇从政权体制层面探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权机构设立的得失却没有对苏区政权建设的过程加以描述；第二篇探讨了1930年代川西北康北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立过程却没有对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内部结构进行解析；第三篇虽然研究了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中的民主制度，并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一些重要政策如廉政、禁毒等进行了探讨，但缺少对根据地县级政权、边区政府内部机制的分析，且仅仅局限于华北抗日根据地及陕甘宁边区，整个研究都没有论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所有这一切皆是本书的遗憾。

不系统、不完整且结构松散难符“20世纪前半期根据地政权研究”之名，故笔者以“感悟”二字示人，望读者批评指正。

如果把学术研究领域比作百花园的话，雍荣华贵的牡丹、光彩迷人的玫瑰固然非常重要，但一些其貌不扬的小花仍然不可缺少。虽然它不能给你带来你所期待的享受，但你只要专注于它，也是会有所收获的。本书正是这样一朵不起眼的小花，祈盼同行的欣赏。

目 录

前 言

第一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研究

引论：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

最高权力机关

最高行政机关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

地方权力机关

地方行政机关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行政监督机关

建立行政监督机关的必要性

行政监督机构的组织和任务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思考

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机关

审判机关

狱政机关

司法机关

国家政治保卫局

司法中的具体制度和基本原则

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制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织选举的机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程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的基本原则

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干部制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干部制度的主要内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干部制度的主要特征

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

国际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建设

共产国际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

第二篇 川西北康北红色政权及相关 问题研究

引论：苏维埃阶级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实践

一、民国时期川西北土司土屯部落变动考

清末民初至1930年代前川西北土司土屯部落的变动

1930年代川西北土司土屯部落的演变

1940年代川西北土司土屯部落的变迁

二、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

红军进入川西北大土司大土官对国民党军的配合

川西北土司(官)“一边倒”地支持国民政府

川西北土司(官)政治态度的特点及原因

三、1930年代中期的川西北康北红色政权研究

红四方面军的阶级政策和川西北康北各民族的左右分化

川西北及康北红色政权

第三篇 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 政权部分问题研究

引论：民主廉洁欣欣向荣的抗日根据地政权

一、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选举中的直接民权制度

过程描述：乡参议员及乡长、村代表及村长的产生

个案分析：村民大会、乡参议会会议及乡村选举中的商人

历史评估：真实的民主

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妇女的参政议政

三、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中的廉政建设

四、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

日伪毒化政策

抗日根据地禁毒的政策法规完备有效

抗日根据地群众性禁毒运动深入持久

参考文献

后 记

第一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研究

引论：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曾发生了许许多多让人震惊并令人深思的重大事件。下面就是其中的两件：

1935 年 12 月，年轻的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已有 4 年历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7 年 2 月又在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作出了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保证。作为一种国家政权，苏维埃在中国消亡。从 1927 年秋天开始的长达 10 年之久的中华苏维埃运动正式画上了句号。

1991 年夏天的苏联处在动荡之中，莫斯科“八一九”事件举世瞩目。它的发生标志着苏共作为有 70 余年执政历史的执政党被赶下了台；它的发生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结束；同样，它的发生也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瓦解和苏维埃政权历史的终结。

众所周知，1920 年代后期至 1930 年代中期的中国苏维埃政权从名称到体制均来自苏联，这已是不争的史实。苏联的集权体制和过“左”政策对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既推动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权和苏区人民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触摸历史，研究者会发现，将“苏维埃”从苏联“移植”到中国，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乃至最终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巨大意义，而且中国苏维埃同苏俄式、苏联式，即苏式苏维埃在指导思想、运行模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个区别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中国苏维埃称为“中国特色的苏维

埃”或“中国式苏维埃”。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着把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政权中国化与企图把中国农村革命政权苏联化两种倾向。在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前者最终战胜了后者，这使一开始就有中国地方特色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及其政权最终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权模式。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苏维埃运动及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学者，注意到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同苏维埃俄国及苏联的相同和相似之处，这无疑是有重大价值的，但对中国苏维埃政权同俄国及苏联苏维埃的区别论述甚少，至于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更是无人论及。那么，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权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在讲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时，说它有三性：人民性、民主性、民族性。对中国苏维埃革命及政权特色的界定我们可以借用毛泽东的这句话。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特色就是人民性、民主性和民族性。

我们认为，对苏维埃政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仅仅看到共产国际、苏共、苏联、列宁、斯大林等等对它的影响。中国苏维埃运动发生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从发生发展的平台来看，受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环境等诸种变动因素的影响，这是苏式苏维埃所没有的；从民族精神和文化历史的演进来看，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忧患意识、民本思想、革新精神、和谐包容开放的民族心态更是苏式苏维埃缺少的。这种有别于苏式苏维埃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就是中国式苏维埃的民族性。

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儒学文化为核心并以儒学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为导向的国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很长时间里，国家是通过科举制度吸引知识分子并让他们参与到国家政权管理中来。知识分子则以正心、诚意、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做人准则和政治理想。这种修身原则和政治诉求在近代并没有中断，而是在近代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下被像孙中山、毛泽东等这样的知识分子继承下来。这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是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影响着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林

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等无不受中国儒学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以各自扬弃的态度和不同的方式把中国民族精神中一脉相承的忧患意识、民本思想、革新精神等贯穿在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中。这样一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持激进主义态度的中共知识分子群体建设下的中国苏维埃政权便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了自身的中国特色。

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性，还因为它的组织者、领导者就是典型的爱国者，他们是为了中国，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才接受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送来的列宁主义，并进而接受斯大林为中国规划的苏维埃运动。当日本军国主义的炮声使中国陷入民族危机的深重灾难而苏维埃国家政权组织已成为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障碍时，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它。在我们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客观要求，果断地从外“移植”苏维埃政权模式，将它“中国化”，并为它的发展壮大奋斗牺牲，当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要求建立新的民主政权时，就及时提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主张，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体现。

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性在华北事变至西安事变后这一历史发展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危机每加深一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权的民族性就越明显。中国共产党人放弃苏维埃政权模式是中国苏维埃政权本身的民族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历史性的抉择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这里民族性体现着人民性。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苏维埃政权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最重要的特色。

江泽民论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其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这一条讲的就是人民性。在中国，人民性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观的中国化，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主义精神。人民性蕴含在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及其组织运行中。这不仅在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建设中有充分的体现，在

苏维埃政权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民主共和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既体现了人民性又体现着民主性。

——工农民众以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地方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乃至最基层的苏维埃乡、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选举制度充分体现了工农民众当家做主、监督、管理国家的权利，苏维埃选举运动锻炼、培养、提高了工农民众参政、议政的能力。可见，苏维埃国家的选举制度体现了人民性和民主性。

——苏维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工农代表构成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及最高司法机关、司法检察机关，还有最高军事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都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产生。它们，包括苏维埃中央政府都受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向它负责。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罢免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司法检察机关、最高军事机关相关领导人的职务。省、县两级苏维埃地方政府以及区、乡、村苏维埃基层政府都由工农民众直接选举的区、乡、村的同级苏维埃代表会议和间接选举的省、县苏维埃同级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并向它负责。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苏维埃代表会议都有权罢免同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可见，苏维埃国家政权体系的组织运行也体现着人民性和民主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根本大法是由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其制定和实施受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及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监督。从国家根本大法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到各项法律法规，如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等无不把保护工农的利益、体现工农当家做主的原则放在第一位。苏维埃各级政府都在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而努力。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各项司法

机关和工作制度，形成了司法制度相对独立的体系。在司法过程中普遍采用的陪审员制度、法庭审判合议制度、法庭审判回避制度、辩护制度、上诉制度、重大案件复核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巡回法庭、群众法庭、司法机关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的制度等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的苏维埃政权在立法、司法及司法监督中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苏维埃政权实行“党管干部的制度”，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监督，中国共产党负有最直接的责任，许多重要的干部采取直接或间接委任的制度，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同时又兼任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职务，但是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许多干部是由工农民众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要求阶级出身好、能代表工农的利益，同时又有相当的行政能力。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共产党的干部而且要求苏维埃国家的干部都必须廉洁奉公、全心全意地为工农服务，成为像巴黎公社委员们那样的“人民公仆”。可见，苏维埃国家的干部制度也体现了人民性和民主性。

——干部腐败和官僚化是近代以来各种国家管理制度下难以避免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发动、领导苏区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廉政运动，并通过法律的力量把腐败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还使官僚主义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这更体现了苏维埃国家政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处理党政关系，执政党和政府同群众团体，如工会、妇代会的关系时也始终把工农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颁布相应的法规予以保障。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代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从根本上体现和维护着苏区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权虽然体现了民族性，并在根本上体现着人民性和民主性，但其人民性和民主化的程度是非常不够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在中央及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中是清一色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共同时代的中国其他党派，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权派、乡村建设派等与苏维埃政权无缘，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则是革命的对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并非各个阶级的联合政权而是工农独裁专政，只有工农群众才享有国家权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下失去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富农成了打击对象，地主则成了专政对象。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追求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法制化，但非法制化、非民主化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镇压反革命，国家政治保卫局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集侦查、逮捕、审讯、判决、执行于一身的特殊机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府成了执政党的派出机构；践踏剥削者及其家属人权，蔑视剥削者及其家属生命的事实层出不穷；肃反被严重扩大化了，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刑讯逼供，很多杰出的革命者和优秀的人才蒙冤受屈，无辜丧生，他们被不公正地非法地处理、杀害而又难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予以纠正；法律法规不少停留在纸上，难以实际贯彻执行；反“围剿”战争后期大规模的、不断的征兵、征粮、公债使民众负担十分沉重；通货恶性膨胀、经济迅速凋敝，经济失败，军事失败，被迫战略转移，苏维埃政权名存实亡，最后不得不放弃。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苏维埃政权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雏形。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政权是历史上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模式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华苏维埃运动及苏维埃政权建设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才值得我们深深地反思。